

重建劳动与自由

——安德烈·高兹对资本主义劳动意识形态的批判

温晓春

(上海理工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 上海 200093)

[摘要] 高兹站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将劳动合理化为仅仅是使用价值的制作,而非工人的自主活动。经济理性的逻辑是当代资本主义戕害自由时间和个人自主性活动的根本原因,而社会主义意义上的自由必然是基于劳动解放和时间解放的真正自由。如何把握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与时间的总体性关系?从这个切入点上高兹建立起了他的“重建真正的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基础。

[关键词] 安德烈·高兹;生态马克思主义;劳动解放;时间解放

[中图分类号] B08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3)01-0064-05

Rebuilding of Labor and Freedom

——Criticism of capitalism Labor Ideology of Andre Gorz

WEN Xiaochun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From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Marxist, Gorz criticizes capitalism economic ration which made labor rationalized to be a process of manufacturing of use value, but not an autonomous activities of laborers. The logic of economic reason is the roots of crippling the free time and person autonomous activities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While in a socialist sense, freedom is necessarily a real freedom based on liberty of labor and time. How to grasp the total relationship in the conditions of late capitalism between labor and time? Gorz lays his founda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rebuilding a real society from this aspect.

Key words: Andre Gorz; ecological Marxism; labor liberation; time liberation

当高兹将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入到经济理性批判之时,显然已经触及了晚期资本主义的真正实质所在。他确立了经济理性批判的核心维度——重建劳动(work),即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将劳动合理化为仅仅是使用价值的制作,而非工人的自主活动;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在其社会过程中将有酬劳动作为劳动者基本伦理和意识形态轴心,而非构建自主性社会。因此,一方面在生产过程中破除经济理性对劳动本性的压制,另一方面在社会过程中取消劳动意识形态

和劳动至上主义伦理,就是高兹寻找“通往天堂之路”的必由之路了。

一 作为政治的消费:受控需求与主体的死亡

在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下,不足的生产与满足基本需求的矛盾赋予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然的基础和人性的目的,至少是在表面上或者客观上。大量的需求必然需要大量产品来满足生命的再生产,而资本主义生产就是以满足人的自然需求(衣食住行等)所产生的消费活动作为自

收稿日期: 2012-12-12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生的乌托邦:拉美新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主义观”(11YJC710057)

作者简介: 温晓春(1978-),女,辽宁鞍山人,上海理工大学讲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己的目的。这在某种程度上论证了一个命题的合法性,即资本主义经济服务的是消费,它是合乎自然和人性的。但是,高兹认为,需求的自然基础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复杂的内在目的。

在富裕社会的新政治经济条件下,理论上个体是从自然必然性中解脱出来了,具有为创造性的人性的目的而进行活动和生产的可能性,而不再仅仅追求自然必然性的人性目的。^{[1]70}但是当下的垄断资本主义却通过匪夷所思的消费意识形态逻辑阻止了将生产从属于创造性活动,甚至泯灭了所有创造性活动,最终永远地将消费从属于生产过程。马克思的预言一语成谶,他说垄断资本主义发现自己面临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是为了客体而将主体塑造为被市场化的;是调整需求满足供给,而不是调整供给满足需求。^{[1]70}

事实上,经济理性的铺展使得社会的所有方面都被支配着,极大地延伸了资本对私人生活的一切方面和各个领域的侵略,经济理性成为了个体在劳动中,在休闲时间里,在家里,在学校,甚至在自己所接触的一切信息里的至高的主人。所以,经济理性暴露了垄断资本主义的真实面目:作为需要以生产为目的的生产,以积累为目的的积累的社会体制,它也是需要建构一个强制消费的社会体制。以同样肯定的口吻,高兹认为资本主义需要的是被动的消费者,这种被动人格的主动特征在消费的意识形态氛围下,被压制到极小化。而在这样的个体人格基础上,体制可以随心所欲地强加给个体的任何目的,赋予体制所需要他具有的任何欲望和意愿。虽然高兹是对现代性的乐观主义者,但是对资本主义的受控消费分析到这里,他却来到了一个交叉路口。在这个交叉路口上他看到与他擦肩而过的鲍德里亚,当然鲍德里亚给我们的理论画面更像是一个末世的愿景,晦暗且令人沮丧。

与高兹相比,也许我们借用鲍德里亚,更能深刻地认识二者同样身处其中的消费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操控本质。在鲍德里亚的作品中,“市场经济消费关系中存在的物只是人的本真需要之死的替身,商品交换中产生的人的需求与欲望也只是意识形态塑形的幻象。在这种种伪构境之中,消费主体不复存在,消费需求也不复存在,消费对象物同样不复存在,一切论文符号象征差异系统中的幻象和关系伪境。”^{[2]78}事实上,鲍德里亚要表达的跟高兹要表达的是同样一个意思,即在消费社会意识形态

操控下和富裕社会无限增值的商品体系的淹没下,主体死亡了。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事实的真相是“需求……不能只是根据自然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命题定义为天生的、本能的力、自发的欲望、人的潜力,而是应该更恰当地被定义为一种功能,它由这一系统(在个人中)的内在逻辑导致,确切地说,不是作为被富裕社会所解放的消费力,而是作为系统本身功能所要求的生产力,再生产和生存过程所要求的生产力。换句话说,因为系统需求它们,所以它们才有需求。”^{[3]82}消费社会,或者说富裕社会中主导的逻辑已经不是马克思时代的生产逻辑,而是消费逻辑。主体需求体系本身的自然性遭遇到质疑和否定,主体的自然性消隐成为被建构的人造物。“不是个体在经济系统中表达他的需求,而恰恰是经济系统推导出个体的功能和与之相适应的物品和需求的功能性”。^{[3]133}

高兹与鲍德里亚不同,他并没有极端激进地挣脱马克思主义,从外部来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拒斥。高兹认为主体的复活和自由的实现仍然要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根上去寻找。事实上,异化消费的个体在他对消费的需求中,其异化状态反映为他的消费活动是生产的中介,异化消费者同生产领域中的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或者白领们一样也被军事般的纪律作为被动的操控对象。被动的消费者并非只是被资本主义通过所谓广告、时尚等等手段所劝服的;相反,资本主义早已在生产关系和劳动条件内创造出被动的个体,它是通过将生产者与他的产品分离,甚至通过将工人同他的劳动分离,将这种异己的劳动变为某种预先决定的和异化的时间来实现的。^{[1]71}因此,从需求的被动化开始,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失去了家园之感。劳动,作为创造性活动的否定,是一个巨大不幸(calamity),是纯粹的满足需求的手段。因此个体的主动的和创造性的需求被肢解了,除了在非劳动(non-work)中,也就是说在被动型的需求的满足中,在消费中,在家庭生活中,个体无法找到自主权的领域。

透过高兹对当代消费社会的批判性分析,我们发现,消费意识形态完成了对主体的谋杀,消费不折不扣地是一种极为隐蔽的资本主义政治行为。^{[2]95}但高兹却又指出那唯一无法被彻底谋杀的领域和能够引导人类在当代资本主义的自主权中,重新上演“出埃及记”(Exodus)的希望所在,还是人的劳动(work)及其解放。

二 劳动的意识形态与劳动的危机

“劳动”,无论从概念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它都属于社会历史的范畴,即它的含义是被社会决定的,也是被历史确定的。如果把劳动仅仅作为一个人类学意义上的概念,那么劳动就只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幻觉了。事实上,高兹认为劳动的概念是一个现代性的作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工业资本主义的作品。^{[4]53}“劳动”概念不可能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的质的形式要比劳动的量的形式占据更为主导地位,在家庭劳动中,妻子的劳动和丈夫的劳动具有不同的性质,不可相互置换。

而现代的劳动“不是指那些创造性的和生产性的行为,而指那些给人带来痛苦、困扰和疲劳的活动”。^{[4]53-54}同时它也是一种“出现在公共领域,表现为可以衡量的、可以交换的、可以相互替换的行为,使它对他具有使用价值”,^{[4]53}不是仅为了满足家庭成员的需要,或者为了特殊的个体,而是针对一般意义上的他人。^{[4]53}在现代意义上,劳动意味着为他人的、对他具有使用价值的、为了获取一定的报酬和补偿的活动。因此,高兹对现代劳动的历史性定义说明,劳动是被经济理性化的抽象领域,这种抽象当然不意味着劳动没有实质性的基础,而是意味着一种社会关系的抽象化特征。他认为劳动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它必须是在公共领域中,而非在私人领域中实施;第二,它的意图必须是为着社会性的他者,而非私密个体(private individuals)。在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它还获得了第三个特征:劳动必须被承认为具有社会效用或社会价值的,这样它才可以同一定量的任意种类的其他劳动相互交换。通过商品的形式,劳动就转变成了抽象劳动,并参与到总体的社会生产过程中。^{[4]54}

既然当代资本主义上的“劳动”是有着特定内含和特定时代内容的概念,那么这个概念的界限就不应该被泛化或模糊。高兹反对有的学者仅仅把“劳动”指认为创造性活动,因为如果仅把劳动界定为创造性活动,那么非创造性的活动,如超市的营业员以及大多数服务部门的雇员的劳动就不属于劳动的范畴;并且,自主性的创造性劳动就和他律性的创造性劳动也一起被归入“劳动”的范畴之中,这的确会造成对劳动认识的混乱。而以内格特为代表的学者把劳动视为一种黑格尔意义上的人类本质的外化,也就是说理解为一种实践活动(poie-

sis),一种个人实现的方式。高兹不认为内格特(Negt)把“劳动”视为“实践”是正确的。虽然内格特十分重视劳动和时间的哲学意义,认为“劳动是一个历史基础性的范畴,会从资本关系中解放出来,并会成为一种转化物质的自主活动”^[5]。因此,他认为“劳动”作为一种“感知—实践活动”,作为我们实际参与塑造客体世界的活动,也就是希腊意义上的实践。因为在他看来劳动就其创造非异化的客体而言是个体理性化的手段。^[6]在内格特看来,“劳动”表示一种非异化的、自主性的活动,通过这样的活动,主体改变和使用着感性的世界。高兹认为,内格特的这样一种劳动概念,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劳动”来说根本就不适用。用这样一种作为“实践”的劳动来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最终结果又是掉落入工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窠臼中。它正是与资本主义的消费意识形态一样的劳动意识形态,它的本质是将主体死死地压制在生产合理性和经济合理性所框定的狭小范围之内,主体片面化为一种经济合理的和数量合理的——因而是抽象合理的空虚之物。这是一种资本主义劳动的乌托邦:劳动就是实践,劳动就是生活。它的真实意图是将被肢解的劳动拼接起来,用寓言的形式告诉工人,这是生活的全部意义和目的。

高兹认为这些理解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最终没有跳脱出经济理性的定势,也不可能以此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危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远远不是非异化的实践活动,它也不可能为走向这样的前途提供任何积极的手段,更有甚者它实际上正在侵蚀和消解着非异化的自主活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现代意义的“劳动”基础上的社会,“劳动的危机”也是存在论意义上的人的全面和自主生活的危机。

由此可见,高兹对现代劳动概念的辨析,其底色明显是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本质和方法。不过,高兹同时也站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立场之上,揭示出了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本质特征,即它的反人性和非主体特征;同时,高兹也表明这样一种劳动并不是人类活动的唯一表现形式,从而为对“劳动的危机”进行剖析和出离“劳动社会”奠定了存在论意义上的基础。

三 重建劳动:私人领域的内在解放

关于劳动是否具有内在解放性的问题,马克思

认为,劳动是人类自我实现的本质形式,是对“类存在”的证明;劳动是实践的批判的“人类感性活动”。^[7]后来,马尔库塞也对劳动和人类自我实现的关系作了经典性阐述:“劳动是人的‘自我实现的行为’,即通过劳动,并且在劳动中,人才真正地第一次成为了他自身。他是以这样的方式成为他自身的,这个成为过程,这个生成过程是自为的过程,因此,他能够认识自身并且认为自己就是实际的自身(人成为他自身的过程)……以这种方式被人所理解的劳动是对特殊的人类的‘存在肯定’,在其中人类的实存得到了实现和确认。”^[8]显然,马克思、马尔库塞和高兹对劳动内在解放性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但他们对如何实现这种解放性的路径存在明显的差异:马克思和马尔库塞认为是在劳动中(within the work),即劳动过程本身具有解放性;高兹则认为首先应当从劳动中获得解放(from the work),即劳动本身并不能使人赢得解放。既然非商品性劳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为自己劳动和自主活动,那么,问题就转化为,要克服经济理性的侵蚀,就必须重建劳动,而重建劳动即意味着重建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只有在这个领域内,作为主体的个体生活和劳动才能实现其自主性和自由,亦即内在的解放。

虽然在古希腊概念中,“私人领域”并不具有任何较高的意义和价值。“在现代生活中,由家庭诱导的对亲密性潜力的培育是微妙而丰富的人格发育的必要前提。家庭是现代个人主义发展的大熔炉,正如小说和精神分析描绘的那样,在那里所有的个人生活史或故事都是内在地有趣的。”^[9]与在受大家庭主导的传统社会里情感纽带的错综复杂性相反,在现代家庭中,在众所周知的“无情世界之外的天堂一隅”中,情感联络是重要和丰富的。同对于“私人领域”的这种新理解相伴随,新教提倡的对普通生活内在价值的强调诚如弥尔顿的诗句歌颂的那样:“我知道,我们每天面对的日常生活,是至上的人生智慧。”^[10]

就劳动和劳动对于人的存在论意义而言,它不仅仅是人得以实现创造性的生命性活动,而且它是人得以实现自由和解放的内在路径。劳动的解放意味着人的真正的解放,而劳动的解放对于在存在主义的隐性逻辑支撑下的高兹而言,与私人领域的解放是同一个过程。私人领域的解放对于个体解放的实现乃至对于在经济理性的压制下,自由主体的重新复活具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个领域是自由和

解放的土壤,主体解放的种子将在其中艰难的抽芽直到结果。实际上,高兹的观点不仅仅首要地考虑被经济理性所殖民的公共领域,同时在私人领域内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商品化也是他的这种考虑的焦点。“为自己劳动”向商品化服务领域的转化,在高兹看来是对传统工业主义精神氛围一个发展的噩梦。比如,以往家务劳动如今被压缩到最小限度,以便个体能够花更多时间在经济理性化的公共领域内劳动,而发达资本主义却创造了一种体制,使得社会上大部分劳动被重新安排到第三领域中去,或者说家庭服务部门当中去。“有观点认为家务劳动会占用大量人员,极大地吸收劳动时间,不过,事实相反,是商业服务发生了这样的功能。现在更多的劳动时间被投入到家务劳动当中去,这事实上比大家自己去做家务占用了更多的人员和时间。”^[11]¹⁵⁵于是,高兹在经济理性的殖民化的意义上,在某种程度上也延续了哈贝马斯的所谓公共领域的殖民化思想。

私人领域的“为自己劳动”和“自主活动”的商业化和经济理性化根本没有解放个体的自由时间,相反,它在更大的范围内创造了社会不平等。事实上,那些收入体面的劳动被少数的技术专家们所从事,并且他们购买大部分人的时间来替他们完成家务劳动。高兹将这种现象称为社会的“南非洲化”(South - Africanisation)。按照这个逻辑发展下去的社会就必然是一个他律(Heteronomy)的全面延伸。

他律性的存在不会造成一个自主的私人领域的出现,所以高兹认为私人领域中人的解放的实质和核心在于劳动解放。如何能在全面控制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劳动解放,高兹认为“当前的重点在于反对劳动的性质、内容、必然性和各种模式,以便使自己从劳动中解放出来。”^[12]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资本主义合理化的一大成果,劳动不再是一种个人的活动,不再受制于基本的必然性,但也付出了重大代价,这就是劳动失去了其界限,劳动不再变成有创造性的了,不再是对普遍的力量肯定,它使从事劳动的人非人化。”^[11]¹⁹⁻²⁰高兹批判资本主义使劳动者失去人性,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他认为,当劳动服从资本的逻辑时,一切的异化在使人不能忍受的同时积蓄着巨大的解放力量,“危机时代也是伟大自由的时代”。^[13]

当高兹以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关怀走向重建社会的时候,他发现,社会存在一种在个体层面和私人领域中自己不曾遭遇的力量。它如此坚固,以至于使高兹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个人与集体之间,或者个体与社会之间的摇摆。他有时激烈地以个体来反对集体主义,有时阐述自己的社会组织理想又不得不承认社会总体化的必然性。所以,高兹虽然极力批判经济理性,但是当从个人上升到社会的时候,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还无法设想一个非总体化的个体自主社会。因此,在高兹那里,社会的政治规划和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规划,乃至对与以个体为基础的自主社会仍然存在一种二元性,即自主与他律的二元社会(Dual Society),或者说即“必然领域”和“自由领域”的二元共存。

所以,高兹要求必须重新思考经济学的界限,在劳动的概念里做出区分,以便避免将没有商业目的的活动作为盈利性活动来对待,以及将其置于生产逻辑之下。高兹反对将工业劳动同作曲家或者科学家的劳动看作同样类型的活动。^{[11]135}我们的体育活动是否应当看做我们劳动的一部分,因为体育给予我们活力从而对经济活动产生效益?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些我们从事的事情不是为着交换的目的的活动,它们没有价格,没有交换价值以及没有“有用性”(utility),而是与满足感相联系,即使那样的劳动会有紧张和疲劳。当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不一定这么看,他们的出发点在于社会系统的功能性,它们只能理解个体活动的功能性,而不是他们对于从事活动的个体主体所具有的意义。于是一切都对系统是有用的,它是对一切事物的总体化。对象化思想天真地认为男人和女人(包括儿童和自然)为系统劳动,不管他们做的是什,它们的现实就栖居在这种功能性里。专制主义和野蛮主义的根源之一也正是在这里。^{[11]137}因此,对经济理性的批判,首先就是区分经济理性的劳动,即盈利性的劳动和非经济理性的劳动,即有意义感的劳动。非商品的劳动按照高兹的标准,他应当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第一,为自己劳动(work-for-one-self),第二,自主活动(autonomous activities)。^{[11]153}

但是经济理性的发展显然没有给自己任何节制和界限,经济合理化的发展如同癌症一样无限制的扩散,高兹认为经济理性的逻辑是当代资本主义

戕害自由时间和个人自主性活动的根本原因。高兹的一生虽然对资本主义激烈批判,但是就其根本来说,他不是一个现代性的反对者,在许多方面,他与哈贝马斯分享着关于现代性的共同观点。他认为:“我们正在经历的并非现代性的危机……当前的危机不是理性(Reason)的危机而是(明显地不断增长的)合理化的非理性动机的危机。”^{[11]1}而且,在许多地方,高兹也表达了对理性的颇为自信的看法。

参考文献:

- [1] André Gorz. Strategy for Labour: A radical proposal[M]. Boston: Beacon Press, 1967.
- [2] 张一兵. 反鲍德里亚: 一个后现代学术神话的祛魅[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 [3] Jean Baudrillard.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M]. Telos Press, 1981.
- [4] André Gorz. Capitalism, Socialism, Ecology[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Press, 1994.
- [5] Oskar Negt. “Aus produktiver Phantasie”, in Wege ins Reich der Freiheit[M]. Berlin, 1989: 69-70.
- [6] Oskar Negt: Die Herausforderung der Gewerkschaften[M]. Frankfurt-am-Main, 1995: 292.
- [7] 卡尔·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143.
- [8] 赫伯特·马尔库塞.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C]//批判哲学研究. J. 德布雷斯, 译. 波士顿: 灯塔出版社, 1972: 13-14.
- [9] 理查德·沃林. 海德格尔的弟子——阿伦特、勒维特、约纳斯和马尔库塞[M]. 张国清, 等, 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64.
- [10] 约翰·弥尔顿. 失乐园[M]. 金发荣,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92-194.
- [11] André Gorz. 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89.
- [12] André Gorz. 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 An Essay on Post-Industrial Socialism[M]. London: Pluto Press, 1982: 72.
- [13] André Gorz. Paths to Paradise: On the Liberation from Work[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5: 1.

责任编辑: 骆晓会